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主编 傅毅才



货币学派

HUO BI
XUE PAI

方兴起 著

P 武汉出版社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HBXP

货币学派

方兴起

HUO BI XUEPA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傅殷才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2

ISBN 7-5430-1466-1/F·162

I. 当… II. 傅… III. 经济学派—世界—丛书—当代

IV. F09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774 号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

货币学派

方兴起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5 插页 字数 185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98.00 元(全套十册)

ISBN7-5430-1466-1/F·162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总序

傅 股 才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通篇贯穿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我国发展的光辉前景，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纲领。这套《丛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我们希望它能开拓读者的眼界，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加强管理经济的能力，以期促进这一宏伟纲领的实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议》中关于 1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提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这套《丛书》正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各家各派中，着重介绍和评论它们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供参考、借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

当前，在世界各国，学派林立，“新”论点、“新”学说不断出

现。各种思潮、各个学派和各个学说之间，各思潮各学派内部，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分歧。乍看起来，简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似乎有许多概念、理论、学派和思潮杂乱相处，极为混乱，没有什么规律性。实际上，当代世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在其发展中有一定的规律性，有其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它们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上各资本集团的利益和矛盾。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学派中，根据它们对待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自由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我们这套丛书的头三册，说的是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和瑞典学派，它们属于自由派，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缺陷和矛盾，主张修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传统教义，认为市场机制已经失灵，只有借助于国家积极调节社会经济过程，才能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接着的六册，讲的是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它们属于保守派，继续坚持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把资本主义看作能够自行调节的“最理想”的制度，主张自由经营，否定国家干预经济。最后一册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它站在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立场上，厌恶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批判传统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大多推崇马克思主义；它既抨击自由派关于国家调节可以拯救资本主义的说教，也批评保守派关于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但是，它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窠臼。

在当代世界的经济学派中，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自由经营和国家干预两大经济思潮。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时而是这种思潮占统治，时而又是那种思潮占上风。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两大思潮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论争,都标榜自己,攻击对方,真是难解难分。一般说来,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自由派鼓吹国家干预论,保守派宣扬自由经营论。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自然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必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不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那就太简单化了。因此,在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的理论中,每一派都或多或少论述了市场经济或国家干预。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知道有哪些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理论或模式,有哪些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的理论或模式,有哪些既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主张国家调节的“混合经济”理论或模式。

既然学派很多,模式不少,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它们呢?

从理论本质来看,这十大学派(除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有所不同)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宣扬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个人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有效率的”、“协调的”、“永恒的”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些“缺陷”或“弊病”,却是可以“纠正”和“医治”的;它们以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们都只是在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联系上兜圈子,而不研究其内在规律及其实质;它们都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把供求论、生产三要素论、阶级调和论等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在所有这些基本问题上,不管什么学派,无论是自由经营思潮,还是国家干预思潮,是没有分歧或基本上没有分歧的。我们对这些基本理论应当揭露和批判,那种对之顶礼膜拜、全盘

接受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从实际的专门研究来看,不管什么学派,无论是主张自由经营的思潮,还是信奉国家干预的思潮,为了替垄断资本家谋取最大限度利润,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的有关问题,反映经济过程中某些具体的、局部的规律性。例如,自由经营思潮中有某些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国家干预思潮中有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某些经验。

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提出的某些经济政策主张,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程度不同地带有某种合理性或科学性。它们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了较详尽的描述,作了数量的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所有这些,都凝结着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利用这些科学的、合理的部分,不能简单地视为引进资本主义,看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明确指出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1992年1月在南方考察期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澄清了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顾虑,为我们大胆引进外国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

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理论,多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撰写《当代世界十大经济学派丛书》,就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是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专家、学者对其学术专著作通俗化阐释的一次尝试,其目的是使广大读者易于了解繁杂的西方经济学,并使之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武汉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之际,慷慨应允并积极组织出版这么一套有价值的丛书,是十分有眼光的。这套丛书的问世,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特别是刘凡主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10月8日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概述:从传统货币学派 到现代货币学派	(1)
第二章 传统货币学派的基本理论	(11)
第一节 17世纪末期至18世纪的 货币数量理论	(11)
第二节 19世纪的货币数量理论	(35)
第三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 货币数量理论	(55)
第三章 现代货币学派的基本理论	(94)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与实证分析	(94)
第二节 市场经济理论	(101)
第三节 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	(111)
第四节 货币理论	(118)
第五节 通货膨胀理论	(130)

第六节	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	(143)
第四章	现代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	(155)
第一节	货币政策的作用	(155)
第二节	货币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	(159)
第三节	货币政策的控制方式	(162)
第四节	货币政策目标	(168)
第五节	货币稳定方案	(172)
第六节	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184)
第五章	货币学派评议	(195)
第一节	正确与谬误的矛盾混合体	(195)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人的自由发展	(205)
第三节	物价与利率的关系	(210)
第四节	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212)
人名对照表		(220)
主要参考书目		(223)
后记		(225)

第一章 概述：从传统货币学派 到现代货币学派

本书将各种货币数量论者都划入货币学派。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从货币数量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货币学派实际上分为传统的货币学派和现代的货币学派，即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前的货币数量论者都属于传统货币学派，而弗里德曼等新货币数量论者则属于现代货币学派。本书侧重评介现代货币学派。而为了做到这点，又必须用一定篇幅介评传统的货币学派，因为现代货币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既具有时代的特点，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货币自然观（公元前5世纪—公元14世纪），这种货币观基于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交换关系，把货币在其中只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用的流通形式，看作是合乎自然的和合理的，而把货币在其中作为流通目的的流通形式，看作是违反自然的和不合理的。货币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货币为“虚构的财富”；第二阶段，货币财富观（15世纪—17世纪中叶），这种货币观把货币看做是一国的唯一财富。因此，认为衡量一国实力的尺度，是该国所拥有的金银量；第三阶段，货币面纱观（17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初），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物物交换的实物

经济,从而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交换手段,像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货币就像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第四阶段,货币经济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划分是就其主流而言的,因此,并不意味着某一时期就只有一种货币观和该货币观只是在这一时期内才出现的。而只是说,在某一时期某种货币观处于支配地位,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

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在货币面纱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最有影响,并且发展得最为充分的货币理论。远在古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就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即国家铸造的货币,可以长期维持着远远高过于其金属内容的价值,但一到铸造的数量过大时,其价值便立刻往下跌落。基于这一现象,法学家鲍鲁斯认为,货币的价值“不但视其实质,且须视其数量而确定”。这里,货币数量理论的见解已清晰可见。不过,一般认为西方货币数量理论产生于16世纪末期,法国律师让·博丹和意大利人达凡茶铁被认为是西方货币数量理论的创始人。

针对当时法国造币厂监督马来特劳关于物价上涨是由于钱币所含金属量减少的观点让·博丹在1568年写了《答马来特劳先生自相矛盾的议论,关于一切物价上涨及其救治方法》一书。博丹在该书中指出,物价上涨的程度大于钱币所含金属量降低的程度,以南美洲流入的金属应负主要责任。他认为,金银的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其数量增加,则其价值即被低评,而与其交换的商品价值自然就要上涨。达凡茶铁则认为,社会上一切货物的总量,与流通的一切金银是相等价的,因此,一国货物总量的一部分,必然等于该国所有金银的相应部分。由此,他认

为货币数量增加，则物价自然上涨。

在这一时期，除博丹和达凡茶铁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外，孟达拉里、约·黑尔斯和托马斯·孟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某些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总之，在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中叶，一些资产阶级的商人和学者，多多少少提到过货币数量论的见解。尽管在这一时期具在压倒一切影响的货币理论是货币金属学说，从而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对当时的经济活动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博丹等人提出的货币数量论的见解，却被后来的货币数量论者所接受，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因而，货币数量学说在萌芽时期由于历史条件酿成的错误，即在一个商业资本具有压倒一切影响的时期里，对货币的分析未能超出流通领域，在后来的货币数量论者那里，成了货币数量理论发展的传统条件。也就是说，一种由历史条件酿成的错误，变成了一种理论发展的“历史条件”。

货币数量理论作为一种与货币金属学说直接对立的货币理论，始于17世纪末期的货币论战。在关于是否需要足值金银充当铸币的论战中，约翰·洛克第一次以货币数量理论同货币金属学说抗衡。可能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评论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时指出：“关于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的学说，最初是洛克提出来的。”自洛克起，一直到休谟，货币数量论者一般都是以欧洲的商品价格随着从美洲输入的金银量的增加而提高这一现象为根据，从货币名目论引申出一种相对货币数量理论。而反对货币金属论，又构成了他们提出这一理论的实际动因。

1797年，英格兰银行因英国对法战争而停止纸币兑换黄金，酿成物价在19世纪初成倍增长。由此引起了一场是否恢复兑换黄金的“金块论”与“反金块论”的大论战。货币数量理论在

这次论战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块论者”的领袖李嘉图以纸币的贬值和与此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为依据,提出了一种绝对的货币数量理论。在论战中,李嘉图理论的信徒詹·穆勒在宣传和解释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中,具体分析了商品量、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等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为后来研究这一问题的货币数量论者提供了思想材料。由“金块论”与“反金块论”的论战演变为“通货主义”和“银行主义”的论战以后,迫于论敌的攻击,李嘉图理论的另一个信徒奥维尔斯顿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影响受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它对物价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尽管他的见解并不新颖,但在李嘉图把货币对物价的作用绝对化之后,作为一个货币数量论者,在论战中明确承认货币对物价的作用的相对性,这对货币数量理论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自奥维尔斯顿之后,一切货币数量论者都是企图通过修正先前的理论来发展和完善货币数量理论。

19世纪中期,约翰·穆勒把货币生产费用论与货币数量论折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供求货币数量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在短期内决定于货币量的供给和需求,在长期内则决定于生产费用。而货币价值决定于供求的法则,受货币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的规律支配。另外,他认为,货币数量理论只适用于金属货币流通的范围,而不适用于信用交易。

19世纪末,一个未因读正统东西太多而囿于成见的数学家,却大胆地把信用交易纳入了数量论的方程式中,这就是美国数学家西蒙·纽科姆。他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85年)中,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社会流通的方程式: $VR=KP$ 。这里,V表示包括银行存款的货币流通量,R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包括现金

和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 P 是物价水平, K 是商品和劳务量。1907年,美国经济学家甘末尔一方面继承了约翰·穆勒的供求货币数量论;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纽科姆的方程式来解决约翰·穆勒认为货币数量论不适用于信用交易的问题。为此,他首先撇开信用因素,分析单纯以货币为交换手段下的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导入信用货币因素,提出了这样一种方程式: $M \cdot R_s = N \cdot E \cdot P_s$ 。这里, M_s 表示货币和支票的总量, R_s 表示货币与支票的平均流通速度, N_s 表示用货币与支票交易的商品总量, E_s 表示用货币与支票交易的商品的平均交易次数, P_s 表示使用货币与支票所交易的商品平均价格。由此公式,甘末尔认为货币数量理论即使在信用范围内也是适用的。

稍后,欧文·费雪从甘末尔的理论出发,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从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如果说费雪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研究的是“长了翅膀的货币”,即流通中的货币,那么,在同一时期,马歇尔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所研究的则是“坐下来的货币”,即持有的货币。马歇尔认为,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研究支配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针对这点,他提出支配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是以通货形态保持资产的比率。利用这个比率,马歇尔创立了现金余额数量理论。此外,阿夫塔里昂等人在这一时期从所得的角度对现金交易论作了某些修改,提出了所得数量理论。阿夫塔里昂认为,一般物价决定于商品的供求关系,而商品的供给决定于产量,商品的需求决定于消费者的货币所得(R),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由于商品生产总量构成社会的真实所得(Q),一般物价(P)就决定于社会的货币所得和社会的真实所得: $P = R/Q$ 。

这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货币数量学说基于货币面

纱观而演变为三种形式,即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现金余额数量理论和所得数量理论。尽管自 20 世纪 30 年代后,货币面纱观基本上被西方学者所抛弃,但是,由这种货币观产生的三种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却被融合到不同形式的货币经济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产生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对后来货币数量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又被淹没在这一时期的第一个货币经济理论体系,是由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提出来的。维克赛尔认为,李嘉图所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比之当时银行学派的空泛讨论要有力得多,因为后者撇开了价格变化原因的分析,而李嘉图学派极端重视贴现政策对货币量和价格的影响。在维克赛尔看来,李嘉图提出的货币数量论具有二个方面的合理性:第一,按照这个学说,货币的价值或购买力的变动是反比例于它的数量的,这个观点合理地表述了货币所特有的价值规定。第二,这个学说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将引起物价同比例变化,这个观点是唯一能够在若干程度上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作出合理解释的。不过,维克赛尔认为,数量论者通常犯有只假定前提而不明白证明前提的错误,从而使货币数量理论存在两个最重要的缺陷:一是完全以货币流通速度在任何指定时间大致不变的观点为根据;二是强调硬币和纸币在交换中的作用,低估了信用票据的巨大效能。他认为,在这两个缺陷中,主要又在于第一个,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带些弹性的量”,是“最无从捉摸的因素——特别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事实上所有别的因素都可以或多或少归因于它。”^①

^① 维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34—35 页。

维克赛尔认为,探讨和利用传统的数量理论的一些合理结论,修正其错误的方面,就可以建立一个“既是首尾贯串的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理论”。因此,在“纯粹的信用制度”条件下,维克赛尔把传统的数量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货币经济理论,即“累积过程理论”。

在 1929—1933 年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继承了马歇尔关于权衡利弊而持有货币的观点,并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权衡性的货币需求,即流通性偏好理论。另外,凯恩斯接受了维克赛尔的相对价格和一般价格的概念,引进就业状况,提出了一种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货币数量理论。具体来说,凯恩斯认为,在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主要会刺激经济增长,其次才会使相对价格上涨;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只能引起一般物价同比例的上涨,而无增加产量的作用。

在战后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现代货币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坎蒂隆、休谟和费雪等人的货币时滞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费雪对货币问题的真实量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流通性偏好理论,从而把李嘉图等人的绝对货币数量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新货币数量理论”。具体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学界在货币理论和政府官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观点有了显著的改变。“在理论方面,改变的方向趋于早期的货币数量学说,但因凯恩斯分析的影响,强调货币的资产功能,而非强调交换媒介功能;在政策方面,改变的方面则在于放弃我们所称的‘信用政策’——即重视利率与信用可能量的政策,而趋向于‘货币政策’——即管理货币数量的政策。重点已经放弃品质管制,而趋向于数量管制。最后,在政策方面又重新注意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的联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弗里德曼于